

2009年正月初六，我和妻子双双背着行囊前往天津打工。回望家门时，映入眼帘的，除了门前五棵高大挺拔的水杉，和水杉下送行的父母儿女等十几个亲人外，那只由我取名为玄彪的9岁的黑狗，也在朝我们凝望着。

那一年我45岁，原本在一家纱厂干了16年文字活儿，几乎天天起草各种五花八门的材料，包括编写需要上报到县里的简报。让我心力交瘁的是，不仅要专注于本职，还被纠缠在工作之外的各种复杂的关系中，而我的付出与所得却又是那样不对称。在这样的环境中我若继续待下去，势必会发疯。春节前我敲了一份辞职书。他们挽留了三天，我还是离了厂。

女儿正在读大学，儿子即将高考，我不能坐吃山空，也无山可吃。正好初三日那天我的一个在天津参与搞高架桥预制箱梁工程的表弟来我家作客，说他那个工地做饭的人和看夜场的人各缺一个，问我们是否愿去。我一拍大腿，坚决地说，只要有份活干，做什么都行！

就要离开家了。那几晚我无法入睡，妻子则默然无语地准备着要带的东西，而一双儿女待在各自紧闭着门的房间里看书、做作业，我知道姐弟俩都在谛听着外面的动静。

表弟他们的工地是在天津滨海新区。达到的当天，我就去看了三里外的渤海。这是我第一次面对

当我在鼓浪屿的工艺美术学校办厂很熟练地描坯时，就想要再谋一份兼职。三十年前的鼓浪屿冷清得很，我在阿艾做事的店门口来回晃了好多趟。她总是在忙。最繁华的龙头路紧挨着泉州路，她做事的店在泉州路的路口。边上的两家店一家卖包子，另一家卖西点。两家对于我都不适合。店门口很开阔，傍晚时分，总有个吹着高刘海的中年女人炸海蛎煎。是个本地女人，常用利落的闽南话骂她边上帮忙的男人。我掂量了下，要是也在这个地盘上摆炸海蛎煎的摊子，这个本地女人肯定会把我的油锅掀翻。

最终我还是在一个下班的时间节点走进了阿艾的店。她正在给一个顾客拆烫头发的小棍子，秀挺的鼻子上布满了一粒粒细碎的汗滴。她很瘦，白净，穿着的长裙在风扇下轻轻扬着，直立的后背，脖颈向上伸展，是跳芭蕾的那种身材比例。我站到她身边，伸手帮她拿下一个个刚拆下的小棍。她抬眼看向我，愣了一下，没有作声。她是一个特别好看的姑娘。很多年后，我再看她年轻时的照片，觉得她好看得让人心疼。我和我的工友们都来这家店里理过头发，都喜欢她柔美而温热的模样。店里只有老板和她两个人做事，而生意太好了。从我下班到她的店打烊，中间好几个钟

在滨海的夜空下

陈少林

一片海，既感新奇又有些麻木。因为是浅海，海水是浑浊的。历史上，天津曾叫直沽，我站立的地方和面对的海面，原属于塘沽地界。当年朱元璋四子朱棣，正是从此处率军过渡，而后向南方挺进，夺了他侄儿皇位的，后来便有了天津这个地名。

我忽然意识到，我离家一千多公里不是来观光旅游和怀古的，于是苦笑一声，踏着白花花的盐碱滩涂地回到了工地。当天夜里我就穿上了绿色军大衣，握着一截直径40毫米的螺纹钢，在一群或土或洋半土半洋大小不一的狗的簇拥、引领、殿后中，开始了我的工地看夜生涯。

正月夜晚的野外，冷得让人浑身打颤，于我这样一个从无北方生活经验的南方人来说，实在是个严峻的挑战。多少个冷峭之夜，我不仅需要抵御包围我身体的寒冷，更要抵御侵入我内心的孤独。全世界都睡了，只有我一个人是醒的，我像是上帝抛错了的一粒沙尘一样，在渤海边的滩涂上游荡。海浪的声音敲着我的耳鼓；近处一列列在黑暗中仍泛着白森森颜色的预制箱梁，酷似放大了数十倍的棺椁；高耸的龙门吊宛如卫星发射塔；不远处高架桥

的桥墩仿佛从地底冒出的远古的巨大石笋；远处城区渺茫的灯光像缥缈的星空，而天空上的众星仿佛回到宇宙深处偷偷睡觉了。但我不能偷睡，我只能找一个背风处随地坐下，点燃一根劣质香烟，只有它才是我的温暖。狗们总是在装模作样地陪了我个把时辰后就悄悄溜回工地宿舍边睡觉去了。我不由怀念起我的玄彪。

冷得实在抗不住的夜晚，我就找来一堆龙门吊轨道的废枕木烧起来。这是我的篝火，也是这个世纪的第十个年头大地上的唯一的篝火吗？在篝火中，我能像我的远祖们一样踏歌起舞吗？不能，不能！我只能就着火光读书。我读《大卫·科波菲尔》，读《双城记》，读《罪与罚》，读《悲惨世界》，还读日间在地摊上用10元钱淘来的80万字的《鬼吹灯》，当我在春天真正到来前读完这本书时，对天下霸唱这个年轻的作者，这个小朋友，佩服得五体投地，而我知道，他就居住在天津市区，离我很近，很近。他让我温暖，也令我害怕，因为他的书中洋溢着民间又香又浓的质朴气息，而群鬼纷涌，又让我毛骨悚然，感觉它们已将我包围，无处可遁。

阿艾

吴其华

点，我想留在这里做帮手。

最终我是留下了。但不是做帮手，而是给老板九岁的儿子辅导作业。每月给我50块钱，跟阿艾的工资一样。我下班来和阿艾一起吃饭，晚上一起去老板家的客厅打地铺。闽南人拜菩萨，那些拜完的水果老板娘都会留给我们。阿艾总是说她白天在店里吃多了，让我一定全部吃掉。她有一条李维丝牛仔裤，是她的渔民男友送给她的定亲礼物。三十年前，鼓浪屿的渔民收入还挺不错。但她说裤子太紧了。我去岛外应聘时，阿艾硬要把这条最贵的裤子给我穿上。她的渔民男友每次船靠岸，都会带来新鲜的虾和螃蟹。不用说，阿艾照例是吃得太多了，不想吃了，一定要看我一只只剥光那些虾和螃蟹。在鼓浪屿看的每一场电影，都是阿艾的男友买票。我和她坐在一排，她的男友坐在后排。

我白天在车间里面面对含有大量天那水和环己酮的劣质颜料，画那些没有生气的小公仔的鼻子眼睛。阿艾说这样下去我的身体会不好。她总是在顾客多的时候拍老板的马屁，老板高兴了，往往都会买来很不错的食材煲汤。阿艾一定要我多

喝汤。

阿艾对我的种种体贴，都生怕我识了出来。那时候的岛上，游客远没有后来那么多，安静的夜美丽得无法形容。常常在店里打烊后，阿艾拉着我的手，踏着人字拖鞋，走在鼓浪屿那些荒寂无人的小巷里面。她穿着长长的裙子，一波一波荡着，一路走一路唱歌。她的乐感特别好，嗓音很有特色，最喜欢唱那几句“在没有理想的土地上住着一群陌生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笑，什么是眼泪，在内心的世界里他们从来不关心别人”。我会跟着她轻轻唱和。

阿艾常常鼓励我去岛外找工作。她怕我和她一样，困在岛上再也出去不了。于是我努力考了一些应聘所需的证件，比如会计证、电脑操作证书等，顺利应聘到了岛外。她为我每一点的收获而激动，大而无当地夸赞我。

而阿艾仍然在岛上。她和渔民男友结婚，生了儿子，自己开了小店。那大约是我们青春里最荒寂最贫寒的一段岁月。我们在没有理想的陌生的土地上生存，除了稚嫩脆弱的青春，真是一无所有。而那又是我觉得往昔光阴里最温暖的部分。今年的暑假，我带着女儿再一



在海滩上的两个冬季，为了取暖和读书，我可能烧掉了好几个立方的浸过柏油的废枕木，后来找不到废的，好枕木也烧过，烧了也就烧了，居然没人追究哪怕提起过。这是恩惠。

春天来了又走了。北方的春天太急，好像一眨眼的工夫就到了夏天。值得记取的是，天津的夏天很好过，就中午热那么个把小时，而秋天的月亮乃是一景，它们从海上升上来，大得出奇，迷离得让人惊叹。我知道，当它们照着我时，也照着家乡的亲人们，我们共同望月时，就在一个经纬度上了。



陈少林，生于1964年10月，望江人，现居杭州。出版有散文集《月亮是盏不灭的灯》等。

次去与阿艾相见。她执意要带我从前我们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鼓浪屿的艺校已经搬空了，我当年上过班的校办厂只剩废墟。泉州路上阿艾工作过的店现在重新装修成了网红小店的模样，专门卖花生汤，门口游客如潮。我们三十年前打地铺的那间房子，早就成了龙头商业中心的一个所在，同样挤满了来来往往的游客。那些我们穿行过无数次的巷子，每一条里都开满了小店，以吃的居多，不停有人拉我们停下来尝一尝。

这小岛远不是当初的模样了，可我和阿艾，居然还在说着从前的人和事。女儿端着她的相机，一路记录下我们的故事。她觉得惊讶，也为上一代的我们感动。在这热闹的人世间，我怕是再也遇不上阿艾这样怜惜我体贴我的朋友了。



吴其华，1975年11月生于潜山，现居潜山，市政工程造价师，业余写作。

